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转型·

农民工工作更换及更换方式对其工资变化的影响

田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利用北京等9个城市近1700份农民工打工史调查问卷对其进城后工作流动与工资收入及收入变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更换工作对其工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更换工作次数越多收入越高,但并不是更换速度越快工资收入越高,工作时间与收入呈倒“U”型,工作稳定性和流动性需要保持平衡,工作时间超过2年工资收入由上升转为下降,这时更换工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更换工作带来的收益在不同群体、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和不同更换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女性、年长者更换工作带来的收入提升显著减弱,受教育程度方面只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才能通过更换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其他学历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网络在更换工作中的作用不显著,而通过个人创业的方式更换工作对收入的正面效应显著。行业内的转换能够带来更为明显的收入增加,伴随职业地位上升的工作更换收入提升亦十分显著。

[关键词] 工作流动; 更换方式; 工资变化; 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 F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6]04-0039-08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6.04.0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城镇化的加速期以来,进城农民工的规模不断壮大,成为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然而,由于制度等一系列障碍,进城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成为城镇中收入较低,工作流动速度快、工作稳定性差的群体^①。一般城镇职工的收入和地位会随其在单位工作时间的积累而获得提升,但是农民工的收入和地位很难随其在某个单位中的时间积累而上升^②。因此,选择流动是他们为提高收入和地位的一种理性选择,一般都是因为工资待遇低、无法提升技能等原因主动更换工作^③。那么,更换工作是否能够带来工资待遇的提升呢?在关于中国农民工工作流动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中,有研究认为工作流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有的则认为流动所呈现的不稳定工作状态不利于农民工工资的提升,具有反向作用。更换工作究竟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有什么样的影响,工作稳定性与更换工作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工资决定因素的讨论中,新古典主义的人力资本、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中的制度因素、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环境因素都被认为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④,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决定农民工工资收入

收稿日期:2015-11-30

作者简介:田明(1974—),男,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研究,城市研究和区域发展研究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过程中地方化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41371165)的阶段性成果。

①田明《进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及其解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张春泥《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社会》2012年第6期。

②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③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Knight John and Linda Yueh,2004,“Job Mobility of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2 pp. 637-660.

④Gerber, Theodore P. 2006, “Getting Paid: Wage Arrears and Stratification in 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1, No. 6 (May); 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的诸多因素在其更换工作中对工资收入的变化分别起什么作用?通过怎样的方式在工作变换中发生作用?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农民工的工作转换及其流动性,也有助于对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因素进行梳理和重新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转换工作对工资变化的影响,最著名的解释来自于人力资本理论,但不同的研究差异很大。一种认为由于转换工作导致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无法在其他工作上发挥,工人难以获得和原职相同的报酬,但是,工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并没有随工作转换而丢失,通用性人力资本的报酬可能在工作转换后上升,因此,工作转换的收入增长效应是不确定的,既可能导致收入下降,也可能导致收入上升^①。

诸多实证研究也没有就工作转换与收入之间的确定关系达成一致看法^②。Munasinghe and Sigman 以 1979—2004 年美国青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较少转换工作的员工会获得较高收入,而频繁转换工作的员工则收入相对较低,这种效果在有经验的员工中更为明显。^③ Gottschalk and Moffitt 研究发现,工作转换对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期美国员工的收入增长没有显著影响。^④ Light and McGarry 研究显示,从总体看工作转换与收入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且停留在原来工作上的工作者会获得较高的收入。^⑤ 关于工作转换方式对收入的影响, Mattila 研究认为转换工作期间是否经历失业对收入变化有影响,没有经历失业的收入会有显著提升,经历失业的收入提升不显著。^⑥ Keith and McWilliam 则发现,因经济因素转换工作及因员工个人因素转换工作都将导致下一份工作收入的增加,因家庭因素转换工作则对下一份工作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而解雇所造成的工作转换则对下一份工作的收入有显著的负影响。^⑦ 年龄对工作变换的收入效应亦有影响,年轻的工作者转换工作会使其收入提高,但这种收入的提高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⑧。

近年来对中国农民工更换工作收入效应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许多研究认为不同于由农业向非农业的初次变换具有显著的收入提升效应,进城农民工初次就业之后的工作变换和职业流动却无助于其工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⑨,工作转换次数与工资水平呈负向关系^⑩。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自“民工荒”以来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近年来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工资水平^⑪,工作流动具有正向效应^⑫。对于不同群体工作转换的收入效应以及不同更换方式的收入效应,黄乾的研究表明,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⑬ 吴克明和成刚的研究表明,辞职者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被解雇者。^⑭ 吕晓兰和姚先国从性别角度研究认为,男性农民工因工作原因、家庭原因的主动流动均显著提高了其后续收入水平,而女性农民工从中获得的收入回报明显弱于男性;单位原

①Becker, G. S. 1962,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pp. 9-49; Parsons, D. O. 1972,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Quit Rates and Layoff R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0, pp. 1120-1143.

②黄乾《工作转换对城市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

③Munasinghe, L. & Sigman, K. 2004, "A Hobo Syndrome Mobility, Wages and Job Turnover", *Labour Economics*, Vol. 11, pp. 191-218.

④Gottschalk, P. & Moffitt, R. 1999, "The Growth of Earnings Instability in the US Labor Marke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pp. 217-272.

⑤Light, A. & McGarry, K. 1998, "Job Change Patterns and the Wages of Young Me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0, pp. 276-286.

⑥Mattila, J. P. 1974, "Job Quitting and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pp. 235-239.

⑦Kristen Keith and Abigail McWilliams. *The Returns to Mobility and Job Search by Gender*.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9, 52(3): 460-477.

⑧Bartel, A. P. & Bojas, G. J. 1981, "Wage Growth and Job Turnov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Studies in the Labor Mark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ncer, J. 1986, "Wage Changes in Job Changes",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London: JAI Press, pp. 171-198.

⑨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刘士杰《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人口学刊》2011年第5期。

⑩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⑪马瑞、仇焕广等《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与收入变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6期。

⑫李长安《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6期;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⑬黄乾《工作转换对城市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

⑭吴克明、成刚《教育的收入效应新探——劳动力工作流动的视角》,《教育与经济》2008年第4期。

因被动流动显著降低了男性农民工的后续收入水平,但对女性农民工影响不显著。^①

工作的流动从相反的角度看是工作的稳定性。有研究认为工作稳定性更高的农民工收入要显著高于流动性大的农民工^②。谌新民等的研究也认为稳定的就业关系有利于企业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和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进一步提升其职业技能水平和工资水平有显著的积极作用。^③李睿等根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发现,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对不同收入的作用程度不同,对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工作稳定性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对中间收入者而言工作稳定性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④

如果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产生正向的影响,那么工作流动产生正向影响的结论就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反之亦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对此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从调查时的现状工资收入和农民工更换工作收入变化的两个角度来研究其工作变换对工资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在整个过程中工作更换方式、途径以及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三、样本数据与更换工作状况

(一) 样本筛选与样本收入水平

本课题组分别于2010年6月和2011年9月先后在北京等9个城市针对非本地户籍流动人口做了2448份问卷调查。去除外出时间不足半年以及户籍为非农的样本后,剩余1714份有效问卷。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工作地和居住地不固定,登记不全面,本次调研选择在城区的社区进行随机抽样和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集聚区(包括开发区、工业园区)抽样相结合,按照2:1的比例调配,并根据流动人口在各城市的行业分布情况对各城市总样本进行结构控制(见表1)。

表1 样本人口学特征及分布(n=1714)

项目	样本数量(个)及所占比例
城市分布	北京 173 (10.11%), 温州 211 (12.33%), 东莞 213 (12.43%), 青岛 253 (14.76%), 无锡 184 (10.75%), 沈阳 149 (8.69%), 郑州 175 (10.23%), 武汉 161 (9.41%), 长沙 195 (11.40%)
性别	男 1061 (61.9%) 女 653 (38.1%)
年龄	20岁以下 142 (8.28%), 20—25岁 556 (32.44%), 25—30岁 300 (17.5%), 30—35岁 184 (10.74%), 35—40岁 169 (9.86%), 40—45岁 144 (8.4%), 45—50岁 125 (7.29%), 50岁及以上 54 (5.48%)
打工年限	2年以下 166 (17.55%), 2—4年 228 (24.1%), 4—6年 162 (17.12%), 6—8年 99 (10.47%), 8—10年 75 (7.93%), 10—13年 91 (9.62%), 13—16年 49 (5.18%), 16岁及以上 76 (8.0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47 (14.41%), 初中 771 (44.98%), 高中/职高/中专 498 (29.05%), 大专及以上 198 (11.55%)
婚姻状况	未婚 762 (44.46%), 已婚 931 (54.32%), 离异及丧偶 21 (1.23%)
来源地特征	城市 181 (10.67%), 小城镇 419 (24.47%), 普通乡村 1112 (64.95%)
行业分布	农业、采矿、电力、燃气和水生产与供应业 21 (1.22%), 制造业 614 (36.17%), 14 (0.82%), 建筑业 260 (15.2%), 交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家政和社区服务等传统服务业 615 (35.82%), 信息、金融、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116 (6.76%), 科学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地质及公共设施管理等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社会组织等其他服务业 84 (4.89%)
工作更换情况	没有换过 384 (22.36%), 换过1次 595 (34.65%), 换过2次 425 (24.75%), 换过3次 180 (10.48%), 换过3次以上 133 (7.75%)
来源区域	东部地区 480 (27.96%), 中部地区 860 (50.09%), 西部地区 262 (15.26%), 东北地区 115 (6.7%)

(二) 不同更换工作次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在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是各类群体中工作流动速度最快的群体。在1714份问卷中,67.64%的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后更换过工作,其中更换1次和2次的分别占34.65%和24.75%,更换2次以上的占18.23%。流动人口为什么会更换工作呢?在被问及上一次更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时,在13个选项中,选择最多的是工资待遇不理想,占总样本的36.31%,其次是想更换环境,占20.22%。目前有更换工作打算的占总样本的24%,打算更换工作的原因有42.11%是因为工资待遇不理想。这就可以看出,收入不理想是农民工频繁更换工作的主要原因。那么,更换工作确实能够提高工资水平吗?

调查时流动人口平均收入为2801.40元/月。按照换工作次数来比较,收入最低的是没有更换工作经历

①吕晓兰、姚先国《农民工职业流动类型与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分析》,《经济学家》2013年第6期。

②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

③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④李睿、田明《进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的,为2634.27元/月,并随着更换工作次数的增加而增加,换过2次工作的调查时月收入水平最高为3210.47元,此后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又有所下降,但仍然比换过1次和没有更换过工作的要高。比较有过多次更换工作经历的流动人口,调查前的每一次工作的平均收入,随着更换工作次数的增加收入上升。

四、模型分析

本节分析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构建模型分析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重点考察更换工作对当前收入的影响是否显著。然后,根据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的相关因素,提取与工作更换有联系的变量为因变量,用以考察变换工作的方式、途径等因素对工资收入变化造成的影响,以其他对工资收入有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分析模型。

(一) 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

借鉴刘林平对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的研究,把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其他变量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包括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企业因素和社会环境(见表2),考察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同时加入更换工作次数,考察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因素中更换工作的影响作用,构建决定农民工工资收入因素的模型如下:

$$\ln W_{ij} = \alpha + \beta \cdot Tnum_i + \gamma X_i + \delta_i \quad (1)$$

式(1)中 $\ln W_{ij}$ 是调查时月收入的对数,为因变量; $Tnum_i$ 是农民工自外出以来更换工作的次数,是单位时间内更换工作的次数,即更换频率; X_i 是一组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其他变量。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具备某项专业技能等5个变量。社会资本因素包括在流入地拥有的当地朋友数量、是否跟家人及亲戚在一起工作或生活,外出年限以及在当前城市的工作时间等4个变量。企业因素包括企业所有制性质、行业、职位、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等4个变量。养老保险是否缴纳主要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因素包括调研城市、来源区域(分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来源地的性质(农村还是城镇)等3个变量。

如表3所示,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 $R^2 = 0.3392$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更换工作对当前的工资有显著影响,与没有更换过工作的相比,更换过工作的收入高,而且更换次数越多,收入越高,从整体来看,每一次更换工作都能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但是,单位时间内更换工作的次数的影响不显著,而且系数为负,就证明虽然更换工作有助于提高工资收入,但并不是更换工作的速度越快,收入会越高。

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是否具有某项专业技能对当前收入都有显著的影响。男性的收入要高于女性,年龄的影响先升后降,与20岁以下年龄组的相比,20—25岁的差别不显著,但是25—30岁,30—35岁的收入显著提高,其中25—30岁的系数最大;35—40岁和40—50岁与20岁以下年龄组收入差异不显著,但是50岁之后收入明显下降,系数为负,呈倒“U”走势。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初中学历组收入差异并不显著,但是高中与大专及以上的收入差异显著,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收入最高。拥有某项专业技能比没有专业技能的收入要高,差异显著。

社会资本因素方面,外出年限、是否与家人或朋友在一起生活以及在当前城市居留时间对当前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在流入地拥有的当地朋友数量有影响,但与没有当地朋友相比,拥有6个及以上时才显著。当前工作的时间长度影响显著,与工作半年以下的相比,工作半年以上的收入明显增加,但是当前工作超过2年的样本组的收入反而比1年—2年样本组的收入要低,呈倒“U”走势。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工作时间所代表的工作经验对收入有影响,但是在企业内部工作的提升主要是在2年内完成的,超过2年工资收入很难有提高。这时通过更换工作来进一步提高收入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企业和工作因素方面,企业所有制性质影响不显著,但行业的影响存在。与制造业相比,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和教科文卫等公共属性行业的收入偏低,而建筑业的收入较高。其他行业与制造业相比并不显著。职位和工种的影响显著,与普通工人相比,商业人员(个体户)、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的收入较高,差异十分显著,而普通工人与小商小贩、销售服务人员、办公及相关人员以及初级技术人员相比并不显著。工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反映了职业技能的差别,其背后是人力资本收入效应的差异反映。

社会环境方面,来源地是否为乡村或城镇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来源不同区域的流动人口在收入方面的差异显著,与来源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入偏低,而东北地区的差异不显著。这可以看出来,在收入方面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具有劣势。此外,除了北京的收入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 2 工作变换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

		logincomenow	Coef.	Std. Err.	T	P > t
工作变动因素	工作变换的次数 0 次 = 0	1 次	0.074 **	0.0339	2.2	0.028
		2 次	0.102 ***	0.0377	2.88	0.004
		3 次	0.101 **	0.0474	2.36	0.018
		4 次	0.157 ***	0.0666	2.65	0.008
		5 次及以上	0.181 ***	0.0699	2.73	0.006
个人及人力 资本因素	性别 男 = 0	女性	-0.189 ***	0.026402	-6.85	0
		20—25	0.068	0.045613	1.49	0.136
	年龄 20 岁以下 = 0	25—30	0.127 ***	0.05116	2.77	0.006
		30—35	0.117 **	0.056873	2.63	0.009
		35—40	0.079	0.05923	1.34	0.181
		40—45	0.016	0.060436	0.26	0.797
		45—50	0.005	0.063628	0.08	0.934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0	> 50	-0.326 ***	0.069387	-4.29	0
		初中	0.041	0.037474	1.09	0.275
		高中	0.091 **	0.042835	2.35	0.019
是否具备某专业 技能 否 = 0	大专及以上	0.210 ***	0.056173	3.81	0	
	具备某项专业技能	0.054 **	0.025597	2.09	0.037	
社会资本因素	当地朋友数量 没有 = 0	1—2 个很少	0.027103	0.034325	0.79	0.43
		3—5 个有些	0.020565	0.033111	0.62	0.535
		6—8 个还行	0.052543	0.044968	1.17	0.243
		9 个以上很多	0.144 ***	0.036541	3.94	0
	当前工作获得途径 公开招聘 = 0	职业中介机构	-0.050	0.064972	-0.78	0.438
		老乡及亲戚朋友介绍	-0.006	0.030408	-0.19	0.847
		当地朋友介绍	0.031	0.052147	0.6	0.548
		个人创业	0.220 ***	0.055854	3.94	0
	当前工作时间长度 半年以下 = 0	其他	0.023	0.063184	0.37	0.713
		半年至 1 年	0.082 **	0.0396	2.1	0.036
		1—2 年	0.108 **	0.0420	2.75	0.006
		2 年以上	0.096 * *	0.0465	2.08	0.038
		企业因素	当前工作所在行业 制造业 = 0	农业、采矿业	0.002	0.107291
建筑业	0.284 ***			0.045756	6.21	0
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	-0.091 *			0.048343	-2.03	0.042
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0.004			0.056584	0.07	0.944
教科文卫等行业	-0.242 ***			0.062475	-3.98	0
当前工作的 职业地位 工人 = 0	小商小贩		0.028	0.074017	0.38	0.705
	销售服务人员		-0.027	0.04785	-0.56	0.574
	办公及有关人员		0.078	0.064941	1.2	0.229
	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0.042	0.042318	0.99	0.324
	商业人员(个体户)		0.362 ***	0.064602	5.6	0
	各类专家、专业技术人员	0.326 ***	0.083807	3.89	0	
	单位负责人	0.526 ***	0.129968	4.04	0	
其他	-0.154 **	0.081922	-1.88	0.06		
没有参加养 老保险 = 0	参加养老保险	0.083 ***	0.029101	3.42	0.001	
	来源地区 东部 = 0	西部	-0.100 **	0.040534	-2.57	0.01
中部		-0.126 ***	0.033959	-3.86	0	
东北		-0.059	0.062101	-0.95	0.341	
	_cons	7.532469	0.136841	62.85	0	

注: 本表不包括检验不显著的变量。* 代表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 代表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二) 工作变换与工资变化的回归分析

上文的分析显示, 更换工作对当前的收入具有正向的作用, 与没有更换过工作的相比, 工作更换次数越多, 收入水平会越高。那么什么样的更换方式、什么样的群体通过更换工作获得的收入增长最大呢? 已有研究表明, 在更换工作导致的收入增长差异方面, 性别、年龄、教育、更换工作原因、更换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收

入水平等都有影响^①。基于此,本部分在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增加因变量,组成因变量组,包括: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工作变换的方式和途径、前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以及来源地区和特征等4类。考虑到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因素主要是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发挥作用,体现为工作获得的途径,把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因素归并到工作变化途径中。鉴于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更换工作的时间并不一致,因此加入更换工作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以反映绝对收入变化的当前工资收入对数与前一份工资收入对数的差值和当前和反映相对收入变化的前一份工资收入的差与前一份工资收入的比值为因变量,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Delta dW_{i,t} = \ln w_{i,t} - \ln w_{i,t-1} = \alpha + \beta \cdot T + \gamma_1 \cdot X_{i,t-1} + \gamma_2 \cdot X_{i,t-2} + \delta_i \quad (2)$$

$$\Delta \gamma W_{i,t} = (W_{i,t} - W_{i,t-1}) / W_{i,t-1} = \alpha + \beta \cdot T + \gamma_1 \cdot X_{i,t-1} + \gamma_2 \cdot X_{i,t-2} + \delta_i \quad (3)$$

模型(2)中 $\Delta dW_{i,t}$ 是当前工作与前一次工作工资收入对数的差值所表示的绝对收入变化,模型(3)中 $\Delta \gamma W_{i,t}$ 是当前工作与前一工作的相对收入变化。 $Turn$ 是与更换工作相联系的因素,包括:(1)行业变化,分为行业间更换和行业内部更换,行业间更换=0;(2)职位变化,根据李春玲对于职业地位的高低分类,在职业上更换工作的类型分为下降、不变和上升三类,其中下降=0。(3)更换工作的途径,包括公开招聘、中介职业机构介绍、老乡亲戚朋友介绍、当地朋友介绍、个人创业、其他等,其中当地朋友介绍=0。(4)更换工作原因,工程任务结束、单位破产关闭、被辞退等被动更换,原工作收入太低,想学习更多知识技能,想更换环境,原工作太累、不稳定,小孩上学等家庭原因,其他,其中工程任务结束等被动原因=0;(5)更换工作时外出年限,分为1年以下、1—2年、2—4年、4—6年、6—8年、8—12年和12年以上,其中1年以下=0。 $X_{i,t-1}$ 是前一份工作的相关因素,包括前一份工作的平均工资收入,前一份工作的工作时长等。 $X_{i,t}$ 是决定工资收入的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更换工作时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来源地区、来源地特征等。

自从2003年开始我国出现民工荒,从那时起农民工的工资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影响我国,并出现了大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和返乡情况,并在2009年达到顶峰。据此把更换工作的时间分为2003年之前、2003年初到2006年底、2007年初到2008年底、2009年、2010年和2011年之后,其中2003年之前=0。

回归的结果及分析如下:

从模型(2)和模型(3)来看,除了本次更换工作之前更换工作次数、前一份工作的时长、来源地特征是否为乡村或城镇没有影响外,其他几个变量都有显著影响。

更换工作之前外出时间越长,更换工作带来的绝对收益越大,但对相对收益的影响不显著。与外出时间小于1年的相比,外出时间超过8年更换工作带来的绝对收益是1.2倍左右。但是模型二显示外出时间的相对收益并不显著。

更换工作的途径亦有影响。无论是绝对收入的变化,还是相对收入的变化,与其他更换工作的方式相比,个人创业获得的收入提升效果最明显。而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寻找和更换工作,并不一定比公开招聘和中介机构介绍获得的工作带来更大的收入增加。

更换工作的原因影响显著。与工程任务结束、被辞退等被动更换工作相比,因原工作收入太低和想找一个能够学到知识和提高技能而更换工作,其绝对收入变化的正向效应十分显著。尤其是后者,不仅绝对收入的正向效应显著,而且相对收入的正向效应亦显著。

工作是在行业内转移还是行业间转移在收入绝对变化上影响不显著,但在相对收入变化上影响显著。与行业间的变换相比,行业内的变换相对收入增长效应会更强。

职业地位的变化在绝对收入方面影响显著。与职业地位下降相比,职业地位不变和职业地位上升对收入变化的正向效应影响显著。尤其是通过变换工作使职业地位上升收入的正向效应尤其显著。但是对相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前一工作对工资收入的变化亦有影响,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前一工作的工资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变化越小,因更换工作而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越低。

无论是对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性别的影响显著。与男性相比,女性通过变换工作而带来的收入增长

^①见文献综述部分。

效应较差。更换工作时的年龄亦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更换工作时收入效应越低。

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在相对收入变化方面不显著,但在绝对收入方面影响显著。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绝对收入增加显著,除大专及以上学历以外,初中和高中学历者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更易于通过更换工作获得工资收入的提升。

来源地亦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相比,来自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绝对收入增长效应要差,处于不利地位,尤以中部地区的农民工为甚。

无论是从模型(2)的绝对工资变化,还是从模型(3)的相对工资变换,更换工作的时间点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从绝对工资变化来看,与2003年之前更换工作相比,2003年之后越是接近调查时点更换工作对工资提升的作用越低,影响显著。也就是说2003年之后更换工作带来的收益远不如2003年之前。从相对收入变化来看,虽然同样与2003年之前更换工作相比,2003年之后越是接近调查时点更换工作对工资提升的作用越低,影响显著,与模型一的结果基本相同。

表3 工作变化及其方式对工资收入变化影响回归结果

		模型(2)		模型(3)	
		Coef.	Std. Err.	Coef.	Std. Err.
变换工作时间 2003年以前=0	2003—2006	-0.155*	0.088441	-2.557**	0.786603
	2007—2008	-0.333***	0.080167	-3.450***	0.714124
	2009年	-0.512***	0.073273	-3.813***	0.656864
	2010年	-0.571***	0.074911	-3.640***	0.671557
	2011年及之后	-0.574***	0.078605	-3.670***	0.7063
换工作时外出年限 1年以下=0	1—2年	0.054	0.054989	0.443	0.488276
	2—4年	0.140**	0.055463	0.528	0.496858
	4—6年	0.142**	0.064151	0.340	0.584688
	6—8年	0.152**	0.074928	0.032	0.685652
	8—12年	0.196***	0.072782	0.301	0.682491
	12年以上	0.289***	0.077842	0.477	0.713291
变换工作途径 当地朋友介绍=0	公开招聘	0.029	0.062692	0.015	0.557407
	职业中介机构	-0.066	0.093268	-0.093	0.827744
	老乡及亲戚朋友	0.014	0.06015	-0.008	0.53325
	个人创业	0.270***	0.069422	1.883***	0.616476
	其他	-0.138	0.091525	-0.33164	0.811545
更换工作的原因 被辞退或任务结束 等被动更换=0	工资待遇不理想	0.125***	0.047331	0.566709	0.420323
	想提高技能	0.218***	0.074761	3.189***	0.663979
	想更换环境	-0.034	0.052404	0.262794	0.465171
	太累、家庭原因等	0.005	0.052033	0.596	0.46243
	其他	0.073	0.074724	0.850	0.662671
变换方式 行业内转移=0	行业内转移	0.040	0.035777	1.042***	0.317709
变换地位地位下降=0	地位不变	0.091*	0.0478	-0.335	0.424713
	职业地位上升	0.111**	0.050319	0.545	0.446439
前一工作收入 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0	1000—1300	-0.436***	0.051023	-1.800***	0.453511
	1300—1600	-0.533***	0.043803	-1.531***	0.389046
	1600—2500	-0.677***	0.040089	-2.139***	0.357808
	>2500	-0.989***	0.050708	-2.559***	0.451853
更换工作时的年龄	年龄	-0.005**	0.00209	-0.025	0.020817
性别 男性=0	女性	-0.186***	0.031576	-0.500*	0.280603
婚姻状况 未婚=0	已婚	0.106**	0.043493	0.319	0.387736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0	初中	0.020	0.047538	0.334	0.423169
	高中	0.054	0.052349	0.499	0.467829
	大专及以上学历	0.191***	0.066232	0.294	0.603871
来源地区 东部地区=0	西部	-0.050	0.050038	-0.749**	0.444816
	中部	-0.092**	0.041271	-0.989***	0.365948
	东北	-0.085	0.07489	-0.660	0.667279
	_cons	1.173273	0.152167	-0.54852	0.265707

注:本表不包括检验不显著的变量。*代表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第一,工作更换对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具有正面作用的同时,但并不是更换速度越快越好,更换工作与工作的稳定对收入的变化有正面影响有一个相对的限度。一方面工作流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具有正向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当前工作时间的增加收入在上升表明工作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高,这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工作时间长度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的增长效应反而下降,工作时间超过2年的收入增长效应低于1—2年的,就证明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稳定性对于收入的正效应是有限度的,当工作时间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就很难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获得提升,需要通过更换工作来解决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也就是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单位时间内换工作的频率与工资收入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工作的稳定性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升,但是当在某岗位上工作时间太长收入的增长效应会降低,这时更换工作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升,因此,更换工作有利于收入的增加,但换工作不是越快越好。这也说明对于农民工来说工资增长在企业内部具有粘性特征,农民工的工资不会随着在单位内部个人经历和经验的增加而提高,但是通过更换工作,他以往的经验技能可能会被新企业识别和认可。由此来看,农民工更换工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对收入的增加具有正面效应,而有的研究又得出更换工作有助于农民工收入的提升。

第二,人力资本因素在更换工作中的收入效应存在,只有更具优势的受教育程度这种显性人力资本通过更换工作才能体现出来,但以工作年限所代表的经验、技能等隐性人力资本对于收入增长具有更大的意义。受教育程度主要体现在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与其他较低学历者之间。这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其在更换工作中的收入效应才有显示意义。农民工是个同质性很高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和高中为主,这必然会影响到用人单位对于他们人力资本的识辨,只有教育水平较高,但数量并不大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才具有显示作用。因为受教育程度都先于工作而存在的,不会随着工作的更换而发生改变,只是通过更换工作而被进一步确认。能够发生变化的是技能水平、经验和见识等非显性人力资本因素。技能水平等非显性的人力资本因素主要通过工作而积累,随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我们看到随着外出打工年限的增加,更换工作的收入效应增加,除非教育程度很高,企业更加重视员工的实际经验和技能。

第三,更换工作的方式对收入变化亦有影响。行业内转换较行业间转换获得的收入增加更为显著。行业间的转换使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无法在其他工作上发挥而遭受损失,行业内的转换损失要小,同时通用性人力资本获得进一步的认可。此外,伴随着工作的更换,与职业地位下降的相比,职业地位不变和职业地位上升带来更高的收入。本样本中,最后一次更换工作职业地位下降、不变和上升的分别占32.91%、48.51%和18.58%。维持原职业地位的占近一半。

第四,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寻找和更换工作,并不一定比公开招聘和中介机构介绍获得的工作带来收入增加效应更大。通过个人创业更换工作收入提升的效应最明显。鼓励农民工更多地在城市创业,经营小本生意、个体商业等是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有效途径。

第五,以提高技能和提高工资收入为主要目的更加积极主动地更换工作比被动更换工作带来的收益更大。这也显示出更换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其愿望。而目的性不强的更换方式,如嫌环境不好而主动更换工作,与因被辞退等被动更换工作相比,虽然检验不显著,但系数为负,这至少说明目的性不强,随意更换工作很难带来工资收入的显著上升。这也提示我们,引导农民工正确看待更换工作的收益这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的内容之一。

第六,前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越高,更换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越低。进入当前工作的时间也有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与2003年开始进入当前工作的相比,2003年之后进入当前工作收入增加效应要低于2003年之前,与农民工工资近年来的上涨趋势相反,不过,从相对收入来看,2009年收入的增长效应最差,这无疑说明2009年我国经济困难所带来的影响。

第七,最后不同群体在更换工作中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由回归结果可知,女性、年长者以及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无论是在工资收入还是在变换工作时的工资变化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尤其是性别,不仅在绝对收入变化方面,在相对收入变化方面已有显著的影响,女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责任编辑:陆影)